

思想周刊

观点

新论

思想者

文史

■ 卜新兵

新年贺词为何多次提到“人民”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指出,2019年,我们将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这是从共和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伟大进程中得出的重大政治判断,是从新时代党领导的伟大自我革命、伟大社会革命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是将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重要依靠。

提出具体而微的举措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真正的英雄。

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发展史观之,党的奋斗史也是人民无私地养育党、支持党、帮助党并和党互为鱼水的融合史。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才会在开国大典上发自内心的欢呼“人民万岁”;也正因如此,习近平主席才会在2014年以来的6次新年贺词中多次提到“人民”,才会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一口气列出吉好也求等5位普通农民、南仁东等6位英雄名字,才会专门向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等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纵观中国历史,无论秦、汉、唐,抑或元、明、清,“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是一个铁律。如何跳出“国家兴亡周期律”问题,毛泽东同志给出的第一条路径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说白了就是政府如何得民心、顺民意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清醒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才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重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才会进一步强调,“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才会在新年贺词中再次强调“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要真诚尊重各种人才”,“要倾听基层干部心声”等具体而微的政策举措。

“创造者”和“守护者”

尊重和发扬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

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们把他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习近平主席强调,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这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为人民群众戴上一顶顶桂冠,称人民群众是“新时代奋斗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曲折性,可能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差别,这就需要人民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牺牲短期的、个人的利益来换取长远的、全局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或“绕开”问题。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主席说“我始终惦记着困难群众”,并要求解决棚户区问题、就业问题,要让新市民感到家的温暖,要如期完成“农村1000多万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追梦精神”的当代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梦想”成为一个高频词。梦想的内容绝不能空洞,梦想的实现亦绝非易事。中国梦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拼搏与奋斗,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纵观6次新年贺词,“梦想”几乎每年必提。从2014年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连在一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到2016年“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2017年“天上不会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2018年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再到2019年“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梦想话语贯穿始终,追梦主体全面覆盖,实现梦想矢志不渝。这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追梦精神”的当代体现。

2019年,我们将迎来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这两个历史节点之所以值得纪念,因为它们是现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节点。40年改革开放则前所未有地调动了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国人民的个体主体意识得到空前的觉醒与增强。

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是个人活动的真正归宿。因此,“利益的协调”将是下一阶段改革开放的着力点和能否成功的关键点。曾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今,民族复兴,需要担当。我们都是新时代的“剧中人”。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逆周期调节力保“四平八稳”

■ 徐贻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通常来说,经济运行可简单地用GDP来理解,会呈现扩散与收敛交替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变化。在经济扩散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环境日益向好,市场需求旺盛,订单饱和,产能不足,投资意愿强烈,资金周转顺畅。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往往偏向通过政策工具抑制经济增长过热。在经济收敛增长阶段,经济发展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市场需求和订单萎缩,产能过剩,投资意愿低迷,资金周转紧张。此时的“逆周期调节”,势必侧重通过政策工具避免经济增长“失速”。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强调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稳住能够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确保经济增长不失速,从而完成既定的重要发展任务。

简而言之,要通过逆周期调节力保经济运行的“四平八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消费、稳预期、稳信心这几个核心变量,以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传统产业就业转岗的平衡,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镇化稳步发展的平衡,中东西部区域协调发展和沿海三大区域引领发展的平衡、经济体制改革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平衡这几对重要发展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有两点可以进一

步关注,即政策的“力度”和“广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09年起代替稳健的财政政策,已有10个年头。从减税降费的政策来看,过去5年营改增累计减税近2万亿元,取消、免征、停征和减征1368项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减收金额3690亿元,力度不可谓不大。更大规模的减税,无疑有助于提振实体经济信心。

向外看,美国的税改外溢效应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为了让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时“轻装上阵”并提振企业投资意愿,除了增值税税率可进一步减并至两档税率甚至降至单一税率之外,企业所得税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长期来看,这需要加快税收结构性改革的力度。至于企业降费的空间,总体来说以降税更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变化,还表现在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上。经验表明,政府投资和国企投资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发挥平抑经济波动的作用。通过加大针对保障民生、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投入,有利于确保经济运行的“四平八稳”。

从“广度”来看,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货币政策不再强调稳健中性,而更加突出稳健,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与其他部门相比,金融部门的顺周期性十分明显,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形成的动态正反馈可

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长期利好

■ 汤蕴懿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政策是保持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出新一轮更大规模、实质性、普惠性减税降费举措,是适应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有为之举。

增值税改革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实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将增值税由工商业扩大至服务业,通过消除服务业重复征税等弊端,使税收制度顺应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发展、适应产品和服务之间的分工协作发展以及跨国服务贸易发展,有利于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崛起,有利于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把减税降费作为稳增长、稳预期的核心来讨论,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态势持续向好,但内外部发展风险持续加大。在此大背景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备受关注。

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进入长周期。虽然新兴产业革命浪潮快速发展,创新全球化不断深化,但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加之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新兴经济体经济脆弱性加大,2019年全球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有所加强。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经过长周期的高速发展后,既有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近期,一些企业尤其

是民营企业要同时面临内外两个转型市场的挑战,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偿债能力遭受考验,需要相应的财政利好政策保驾护航。

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和长期利好。那些企图动摇企业信心、唱衰中国经济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要。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大规模减税降费必将为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打造有定力、有韧性、有温度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提供有力支撑。

首先,强化逆周期调节,保持经济增长定力。

针对全球经贸动能回落、国内周期下行、贸易战拖累外需等周期性因素,2019年宏观政策强调逆周期调节,通过减税降费,实行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为此,尤为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把握主动。

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增长韧性。

减税的目的不仅是缓解企业压力,保持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激发市场活力,完善经济结构。要通过减税,加快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在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的同时,培育经济新增增长点、新动能和新供给。

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不断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深化国有企业改

以放大经济景气繁荣和萧条程度,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仅就股票市场而言,在中美贸易摩擦、股权质押融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2018年中国股市的投资者信心受到冲击。未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势必需要重塑投资者信心,而重中之重是杜绝非理性的暴跌行情重演出现。这就需要股票市场如同外汇市场一样植入“逆周期调节机制”。

进一步来看,政策性担保或发挥更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不断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例如,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商业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在经济收敛增长时期,中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日趋严峻,利润率出现下滑,信用风险上升,商业银行往往倾向于收紧信贷投放。但政策性担保属于政策性金融,由财政出资,应当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认真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而不应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经营目标。同时,政策性担保机构通过对货币供应进行结构性调整,扶持中小微企业获得资金,又可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逆周期调节手段的纽带,应当引起重视。

总之,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我们还有许多逆周期调节手段。通过狠抓相关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实施落地,2019年的中国经济一定可以稳中应变、变中解忧。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 金五洲

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连续三次提到“微观主体活力”:第一次是在总体部署2019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第二次是在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时,提出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第三次是在部署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时,提出要“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三次提出“微观主体活力”传递出未来经济发展新动向,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内生动力。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微观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搞活微观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的重要支撑。其中,中小微企业是“双创”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微观主体活力”不会从天而降,关键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和社会创新活力。那些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最终都进入到所谓“企业家经济”的阶段,企业家精神成为企业成长的基因和效率提升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为此,我们需要在“破”、“立”、“降”上下功夫,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向深入。同时,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断培养企业家精神,不断激发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是市场活力的生力军。在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出台一系列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政策保障和制度创新,化解挡在民营企业面前的“市场冰山”、“融资高山”、“转型火山”,强调打通摆在中小微企业面前的“旋转门”、“卷帘门”、“玻璃门”,从而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家的发展决心、转型信心。

(作者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 孙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9年七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要求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领域深挖国内市场潜力。

当前,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居民对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是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2018年1月至10月,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2.1%,而家政服务、医疗保健、房租、教育文化娱乐同比涨幅分别高达5.6%、4.7%、2.5%和2.2%。但随着消费结构升级,服务业供给不足问题日益显现。

一是服务业的各项指标仍处于较低水平。例如,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制造业,而且远低于发达国家,仅是美国的1/8,日本和法国的1/7(以2010年为基数计算)。

二是服务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其中,旅游业的贸易逆差占整体服务贸易逆差的70%左右。我国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6.5%,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三是短期供需失衡。2018年国庆期间,我国实现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超过9%,占全年法定假日旅游总收入的50%以上。将大起大落的假期旅游消费适当平滑化,对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微观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证明,平滑消费是效用最大化的消费选择。在股票市场,如果股票价格大幅波动,就无法反映上市公司真实的内在价值,而只会增加市场恐慌。商品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即利率)、货币的价格(汇率)都是一样的,不宜大起大落。

(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研究系列”专栏

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定),将知识产权保护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此后,政府加强宏观统筹,形成行政、司法双管齐下的保护体制,并强调海关在进出口方面的职能。

在探索适应阶段,专利保护成为知识产权工作的重心。为此,我们进一步加强专利工作队伍建设,推动专利法律法规研究,提高专利审查综合能力。同时,知识产权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

2008年国务院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此为标

志,我国进入知识产权制度主动变革的新阶段。同一时期,全球爆发金融危机,我国开始主动修订知识产权制度,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维护自身利益,并开始布局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知识产权制度。

党的十八大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并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被提到新的高度。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相关各国政治、法治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的输出因其独特性成为开

展经贸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新时代,以网络化、智能化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站在新起点上,我们要准确把握新技术、新业态的新要求,积极探索“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例如,注重特定领域的知识产权战略规划。聚焦新技术领域和新业态发展,加快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会聚技术等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规划,积极探索知识产权保护新方向。

又如,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以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为依托,不断优化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平台建设,保障数据安全,提高知识产权审查效率与效能,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水平。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